

俠義文學的「案件」模式

吳泊諄

原題：徐富昌教授「俠義文學」期末考題 2

文藝母題（永恆的文藝主題）決定作品的基本結構和敘事形式。文藝母題就好比是酒瓶，而具體的文藝作品是裝在酒瓶裡的不同品種不同質量的酒，從某種意義上講，文藝創作都是「舊瓶裝新酒」。請就古龍的「楚留香傳奇」、溫瑞安「四大名捕系列」與《三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等作品的連結中，觀察他們的「雷同」與「類型化」，進而論述他們呈現了什麼樣的「敘事模式」？

若要分析古龍「楚留香傳奇」、溫瑞安「四大名捕系列」與《三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等作品的連結，勢必要先從俠義文學的歷史脈絡與社會背景談起。俠義思想早在先秦時代就有其脈絡可循，如法家的「俠以武犯禁」、墨家的「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關於俠客的傳記式描述也可追溯至《史記·遊俠列傳》，不過一直要到唐代才出現與現代武俠小說性質較接近的文學作品，唐傳奇中著名的虬髯客、紅線、聶隱娘等角色，似乎也成為後來武俠小說人物設定參考的典型範例，隨著宋元話本、明清章回小說一連串的文學發展，清代中後期逐漸演變出一種結合公案與俠義兩平行線的新型態小說類型，而開山之作正是《施公案》（嘉慶年間，十九世紀初），隨後《三俠五義》（嘉慶、道光年間，十九世紀中）可說是清代「俠義公案小說」的登頂之作，也是數百年包公說書故事的集大成者，接續的《彭公案》（光緒年間，十九世紀末）等作品也大多延續「公案為主，俠義為輔」的主要敘事架構。近百年後，歷經舊派、新派武俠小說的洗禮與西方、東瀛元素的交互融合，出現「楚留香傳奇」（民國，二十世紀六零年代）、「四大名捕系列」（民國，二

十世紀七零年代)等,乍看之下已與清代俠義公案小說毫不相干,但細細品嚐後卻又發現有跡可循的新時代武俠小說,本文將進一步分析上述作品之間的關聯與相似之處,並說明其「敘事模式」。

淺談完俠義文學的歷史脈絡,似乎也要談談各時代的社會風氣,了解環境背景後,才能更深入探究小說的創作緣由和作者想要傳達的思想,進而分析其類型化與敘事模式。《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的成書年份雖有數十年差距,不過又因為版本眾多與續作複雜交錯,應可歸類為同時期公案與俠義題材融合的重要產物,公案方面延續既往公案小說的刑事與民事案件,並隨著素材積累,發展出案中有案、數案相關等複雜模式,而隨著俠客的出現,刑事與政治案件的比例增高,並讓官吏的辦案手段更加多元,不過或許是受到清代嚴謹的法秩序限制,縱使清代中葉以後政局逐漸混亂,但小說中的俠客形象似乎永遠只是陪襯清官的輔助者,形成俠客依附清官獲得合法性與清官利用俠客武力破案的利益結構,雖然清代晚期的小說有逐漸邁向「俠義為主,公案為輔」的趨勢,但依舊無法擺脫清官與俠客兩者之間主從關係的枷鎖。而在老百姓與文人眼中,清官是面對現實專制社會中被酷吏折磨的美好幻想,而俠客則是庶民自身的精神寄託與沒有勇氣達成的理想境界,既然意識到在現實社會中絲毫無法撼動貪污腐敗的政局,就只好訴諸於文學,透過小說人物打倒不公不義的暢快情節來抒發內心委屈,若從悲觀的角度來看,俠義公案小說可說是清代社會底層人們暫時逃離貪腐的麻醉劑、鴉片¹。

將時間往前推進一百年,來到民國六、七零年代,也是現代武俠小說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的茁壯歲月,此時的政治體系早已擺脫皇權至上的封建制度,

¹ 參考資料:

霍建國(2005)。從公案到俠義—《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小說研究。

林怡均(2011)。英雄猶怕出身低—論《施公案》與《三俠五義》中的俠客。《朝陽人文社會學刊》,9(1), 109-140。

雖伴隨殘酷的戰爭與過渡性的獨裁政權，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潮已席捲而來，武俠小說中「俠」的概念已逐漸擺脫傳統封建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作者投射在角色身上的獨立人格，並吸收西方與東瀛文學的多元素材，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琴棋書畫、占卜醫術、諸子思想等元素，開創俠義文學嶄新局面。

從溫瑞安對角色性格的深刻描述可以發現，「四大名捕系列」的冷血、無情、鐵手、追命，不再是《施公案》的黃天霸、《三俠五義》的展昭、《彭公案》的馬玉龍等需要依附於清官的俠客，而是成為擁有獨立人格的個體²，當然，諸葛先生也不像施世綸、包拯、彭鵬等不會武功的清官，也不需要時時刻刻顧忌皇帝的想法，年事已高卻還願意留在朝中輔佐皇帝，也是出於自身為國為民的意願而非情勢所逼，「四大名捕系列」中官府雖在但其影響力已逐漸降低，官場點滴也非劇情重點。「楚留香傳奇」幾乎徹底擺脫官府的元素，將故事發展的地點全然建立在虛幻、自由的江湖世界，絲毫沒有皇權、官吏的影子，楚留香的形象也絕非只有俠義公案小說中俠客打擊犯罪的單一面向，而是擁有豐富個人色彩的風流盜帥，古龍也不只對主角的描述用心，像是中原一點紅出手毒辣但重情重義，或是無花風度翩翩背後的卑鄙可惡，都讓角色被賦予更多的生命力與趣味性。

稍微了解《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四大名捕系列」與「楚留香傳奇」之間的脈絡關聯與歷史背景後，回到究竟他們有何「雷同」與「類型化」的問題。雖然如上述在創作緣由、精神價值等面向，《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等清代俠義公案小說與「四大名捕系列」、「楚留

² 角色擁有獨立人格的先決條件是作者必須對其性格多加描述，清代俠義公案小說中，雖俠客眾多但大多無法讓讀者一窺其內心世界，這也是因為作者將主要的篇幅用於推進公案劇情發展，而非塑造各別人物的形象。以筆者的個人經驗而論，想到俠義公案小說，浮出腦海的是「楊香武盜九龍玉杯」、「狸貓換太子」等著名橋段，不過當提到「四大名捕系列」時，印象深刻的卻是諸葛先生與四大名捕的人物形象，反倒對具體這些角色做了什麼豐功偉業或破獲何等驚天奇案的細節較為模糊。

香傳奇」等現代武俠小說，似乎是兩個時代截然不同的作品，不過在主要劇情方面，這些作品大多圍繞某「案件」（也因武俠的成分逐漸增加，因此案件多為刑事案件）進行³，例如《施公案》的無頭案、《三俠五義》的狸貓換太子案、《彭公案》的白如意案、《四大名捕鬥將軍》追捕凌落石案、《血海飄香》的天一神水案，都是藉由破案的過程（且大多也都破案成功）來推進人物與劇情發展。

既然都是以推理案件、追捕犯人作為主要劇情脈絡，那究竟是何種關鍵因素造成同樣類型的小說，帶給讀者如此不同的閱讀感受呢？本文認為有兩大因素：身份與價值。如上述關於角色身份的說明，《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的主角是清官以及幫助其抓捕犯人的俠客，都具備朝廷任命的公權力性質；而「四大名捕系列」的神侯府逐漸擺脫傳統衙門架構，成為直通皇帝的獨立機構，更不用說「楚留香傳奇」已看不見傳統政治體系的身影，既然打破傳統政治架構的枷鎖，作者也因此能賦予角色更多自由色彩，並創造更多意想不到的劇情發展。另外在價值觀方面，公案小說主要還是在滿足老百姓希望官吏能懲惡揚善的心態，因此較多傳統道德層面以牙還牙的劇情，相較之下破案的過程並非重點，例如公案小說常見各種託夢緝兇，甚至《三俠五義》還出現「烏盆訴苦別古鳴冤」等超自然破案法；相較之下，「四大名捕系列」與「楚留香傳奇」破案目的逐漸擺脫官方色彩，而是主角們自我價值的體現與追求，這或許也是受到西方偵探小說亞森羅蘋、福爾摩斯等的影響。

分析完《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與「四大名捕系列」、
「楚留香傳奇」在劇情圍繞「案件」進行的雷同之處，以及在此類型化的架構

³ 清代俠義公案小說或許受到說書的影響，案件縱使互相關聯但篇幅頂多橫跨數個章節，而現代武俠小說往往一本書就只講述一個大案件，說明故事的架構趨於龐大，人物之間的關係也更加複雜，也或許是作者願意花較多篇幅鋪陳、累積讀者情緒並塑造氣氛的緣故。

下，俠義文學又是如何隨著時代背景發展出不同的變形產物後，最後要來談談這些作品呈現何種「敘事模式」。

敘事模式可從敘事角度、敘事時間、敘事結構、敘事背景四大面向分析⁴。

傳統長篇小說多採全知觀點作為敘事角度，公案小說因受說書影響更是如此，因此《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皆以全知觀點為主，讓敘事者（說書人）可以自由進入各個角色的世界，方便描述破案過程，不過隨著小說的多元化發展，到了清末，《九命奇冤》除了既有的全知敘事，有時也搭配限制敘事來增加劇情張力⁵，更不用說「四大名捕系列」、「楚留香傳奇」等現代武俠作品，更是配合劇情在各種敘事角度間自由轉換，除了主要劇情推進仍多採全知敘事，進入懸疑場景時，作者往往使用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視角，帶領讀者身臨其境，與主角們一同對案件產生困惑、緊張，想像自己也是主角旁邊的小助手，來增加案件的真實性與參與感。

敘事時間可概括分為連貫敘述與交錯敘述。如同小說從單一到多元的發展歷程，《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大多維持傳統單一時間線的表達方式，雖有案中案、大案中間穿插小案、數案相連等手法⁶，但尚未打破案件發展的自然時序，直到清末民初開始，或許是受到西方偵探小說以及後來西方電影多種分鏡技巧的影響，敘事的時間軸不再單一、線性，開始出現多條時間軸、倒敘等手法，「四大名捕系列」、「楚留香傳奇」雖大體維持連貫敘述，但中間也有角色回憶陳年往事等交錯敘述，藉此營造推理、懸疑氣氛。

⁴ 以下針對敘事模式的分析方法參考課程投影片「武俠小說的文體特徵」。

⁵ 關於《九命奇冤》的參考資料：

論《九命奇冤》的敘事技巧，<https://paper.udn.com/udnpaper/POC0004/37565/web/>。

⁶ 例如《三俠五義》「狸貓換太子」案在首回登場後，直到第十五回《斬龐昱初試龍頭劍，遇國母晚宿天齊廟》到第十九回《巧取供單郭槐受戮，明頒詔旨李後還宮》才又被提及。

敘事架構已在前述談及作者如何安排角色與劇情的部分有所著墨：清代俠義公案小說大多以案件發展為主軸，而現代武俠小說逐漸以描繪人物形象為中心，破案歷程多具備襯托角色性格的功能。敘事背景在談及創作背景時也有提及：《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等公案小說仍是以官府為主要地點，也有明確的歷史年代，甚至人物也多為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人物，只是渲染其經歷，而「四大名捕系列」、「楚留香傳奇」等現代武俠小說大多已跳脫既定歷史框架，將案件場景來到廣闊的江湖世界，提供作者更多揮灑空間。

本文一路從俠義文學的歷史脈絡、創作背景、價值精神談起，並分析「楚留香傳奇」、「四大名捕系列」與《三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等作品在敘事模式上的類型化現象，概括來說，此類「案件模式」的作品發展到後期，成為一種以古代江湖為背景、結合武俠形式的破案小說，並融合古今中外公案、俠義、推理、偵探、懸疑等元素，創造出獨特的敘事模式。